

全国高等学校重点规划系列教材



史记导读

张新科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重点规划系列教材

史记导读

SHIJI DAODU

张新科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导读/张新科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04-042283-2

I. ①史…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0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1008 号

策划编辑 张晶晶 责任编辑 张晶晶 封面设计 张文豪 责任印制 高忠富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江苏德埔印务有限公司		http://www.hepsh.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印 张	14		http://www.landaco.com.cn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购书热线	021-56717287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010-58581118	定 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2283-00

史记导读

主 编：张新科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雅琴(渭南师范学院)

王长顺(咸阳师范学院)

刘向斌(延安大学)

任 刚(西安工程大学)

高益荣(陕西师范大学)

梁建邦(渭南师范学院)

王 双(唐山师范学院)

刘 宁(西安文理学院)

池万兴(西藏民族学院)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

凌朝栋(渭南师范学院)

前言

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他的精神感动着后人,他的著作影响着后人。《史记》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巨著,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文史结合的典范。我们阅读和学习《史记》,既可得到历史的教益,也能获得艺术的享受;普及和研究《史记》,对于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史记》体大思精,我们要进入司马迁的世界,真正读懂他,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本书的宗旨就是从《史记》的基本问题入手,逐渐深入,对读者阅读和研究《史记》起引导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史记》成书的文化背景、《史记》的体制及宗旨、《史记》的百科全书特征、《史记》的进步思想、《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史记》的叙事风格、《史记》的写人艺术、《史记》的语言成就、《史记》的抒情色彩、《史记》有关疑案的梳理以及《史记》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等。每章后附以延伸阅读和思考练习。本书既适合高等学校《史记》教学,也适用于广大文史爱好者阅读。

本书注重实用性,首先,致力于普及与提高的结合。既有一般常识的介绍,又有编纂者对《史记》价值的理解。继而,把理论概括与作品分析尽量自然地结合。以《史记》中的各篇章为研究对象,归纳有关理论问题,不空发议论。另外,把导读与延伸阅读相结合。每章的导读结束后,附有关资料,并提出有关思考问题,把学和思结合起来。这种结构安排,有助于引导读者深入认识《史记》。

本书曾以《史记概论》为题,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高校“史记研究”课程教材。原分专题探讨和作品提示两大部分。本次重新修订,删去原教材中的作品提示部分,加大专题论述的分量,每个论题都在原基础上进行了较大修改,充实和补充了有关内容。为了帮助读者全面认识《史记》这部书,把原“《史记》研究史略”专题换为“《史记》有关疑案梳理”,就《史记》本身的一些悬案进行介绍,以便引起更多的讨论。同时,增加“《史记》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一章,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史记》的世界意义。这两章内容,曾在学术刊物发表,本次略作删节。另外,更换了每章的思考题,增加了“延伸阅读”,补充了有关资料,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专题问题。

本书的编写者和分工如下:第一章,高益荣(陕西师范大学);第二章,马雅琴、凌朝栋(渭南师范学院);第三章,任刚(西安工程大学);第四章,王双(唐山师范学院);第五章、第十章,王长顺(咸阳师范学院);第六章,池万兴(西藏民族学院);第七章,刘宁(西安文理学院);第八章,刘向斌(延安大学);第九章,梁建邦(渭南师范学院);第十一、十二章,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最后由张新科统稿。

期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15年8月

目 录

.....	第一章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1
	第一节 《史记》的史学价值与地位	2
	第二节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4
	第三节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13
.....	第二章 《史记》成书的文化背景	21
	第一节 天下一统——《史记》成书的政治背景	22
	第二节 文化整合——《史记》成书的学术背景	24
	第三节 父子相传——《史记》成书的家学背景	26
	第四节 游历全国——《史记》成书的生活体验背景	28
	第五节 李陵之祸——《史记》成书的个人遭遇背景	31
	第六节 成就功名——《史记》成书的人格精神背景	33
.....	第三章 《史记》的体制及宗旨	39
	第一节 以“五体”为主的体制	40
	第二节 《史记》宗旨确立的历史基因	48
	第三节 究天人之际	51
	第四节 通古今之变	53
	第五节 成一家之言	54
.....	第四章 《史记》的百科全书特征	59
	第一节 《史记》百科全书特征的表现形态	60
	第二节 《史记》百科全书特征的形成条件	69
	第三节 《史记》百科全书特征的深远影响	72
.....	第五章 《史记》的进步思想	77
	第一节 进步的历史思想	78
	第二节 开明的政治思想	82
	第三节 富国利民的经济思想	85
	第四节 民族统一思想	89

.....	第六章 《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	93
	第一节 《史记》与民族精神的形成	94
	第二节 《史记》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101
	第三节 《史记》民族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107
.....	第七章 《史记》的叙事风格	111
	第一节 立体叙事	112
	第二节 宏大叙事	113
	第三节 全知叙事	114
	第四节 反讽	120
	第五节 复调	123
	第六节 主旨与文心	124
.....	第八章 《史记》的写人艺术	131
	第一节 《史记》对历史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	132
	第二节 《史记》从悲剧的视角刻画悲剧人物	134
	第三节 《史记》人物的性格刻画	139
	第四节 人物形象的刻画	143
	第五节 《史记》对人物的外貌描写	144
.....	第九章 《史记》的语言成就	149
	第一节 凝练生动的叙述和描写	150
	第二节 个性化的人物语言	154
	第三节 诸多修辞手法在语言中的运用	155
	第四节 对诗歌的引用和对民间语言的提炼	157
	第五节 语言蕴涵着丰富的情感	160
	第六节 《史记》语言对后世的影响	160
.....	第十章 《史记》的抒情色彩	165
	第一节 《史记》抒情性的表现	166
	第二节 《史记》抒情性产生的原因	171
	第三节 《史记》的抒情方式	174
.....	第十一章 《史记》有关疑案的梳理	183
	第一节 《史记》的断限	184
	第二节 《史记》的缺补	187

第三节 关于太史公释名、《史记》书名的争论	189
第四节 《史记》倒书问题	191

第十二章 《史记》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	195
--------------------	-----

第一节 《史记》在海外的传播情况	196
第二节 《史记》在海外的研究状况	198

第一章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史记》的史学价值与地位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司马迁像

司马迁(前 145 年—约前 90 年),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活在西汉中期,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郭沫若先生曾赞颂他“功业追尼父”,认为他是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人。《史记》不仅囊括了孔子所致力诗、书、礼、乐,还集百家之学,涉及哲学、历史、文学,乃至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科技、农业诸领域。

第一节 《史记》的史学价值与地位

《史记》是一部记载从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代的纪传体通史,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从此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书的主要体例,延续近两千年。司马迁的修史原则及其正直的人格无不对中国历史学家有着永久的影响。

一、奠定了中国史书的编撰体例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首创了纪传体记史的体例,对中国传统史学有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史书编撰体例。此后各代正史都是按照《史记》所创立的体例来书写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纪传体编撰体例作了概要说明: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①

由此可以看出,《史记》的基本结构框架是“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史记》以这五部分形成了一个结构完整、体系严密的编撰历史的体例,对中国后来的史书编撰具有深刻的影响,形成后世史书写作的一定格式,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的那样:“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通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末。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

^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319 页。

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①对此问题,可参看本书第三章有关论述。

二、树立了“秉公直书”的良史风范

司马迁通过《史记》为后世史家树立了良好的史家风范,首先是史家的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亲者讳。由于司马迁生长在一个“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世典周史”的有史官传统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史学家。这样的家族、家庭对形成司马迁富有正义、刚正不阿的史家风范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史记》的《晋世家》里详录了古之良史董狐“书法不隐”的史实,《齐世家》里记述了不畏满门被斩,敢于大胆直书“崔杼弑其君”的齐之良史。司马迁把不畏权臣、不怕掉头、敢于直书的史家风范视为史学家必须自觉遵守的一种史家精神。他在写《史记》所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实录”精神,成为中国史学长期为人珍视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把汉代最高统治者的真实事迹记录于史册,突破了孔子所言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古训,表现出一代良史的正直人格力度,为后来修史者确立了“博采精选、翔实可靠和善恶必书、纪实征信”的修史原则。

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说:“史之不直,代有其书。”^②由于作史者以曲笔阿谀,于是便使历史上“空传伪录者矣”。司马迁却不是那样,他自觉追随齐之太史、晋之董狐这些良史风范,如在《高祖本纪》中,他秉公直书刘邦一生的经历和主要事迹,既记述了刘邦作为政治家善于顺应民心、举贤任能、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优点和长处,同时又如实地记载了刘邦好酒贪色、外宽内狭、猜忌残忍,有时近乎流氓无赖的缺点和毛病。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刘邦是汉代开国皇帝,又是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曾祖父就隐去他“好酒及色”的劣迹,也没有因为对项羽为人的推崇、结局的同情,而隐去刘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充分肯定了刘邦取得天下的功业,肯定他善于用人、从善如流的优点,尤其是从领导艺术、人才观念的角度,肯定刘邦是一位政治家,但对刘邦的无赖行径并没有隐去,如楚汉战争间,当项羽要烹他父亲时,刘邦竟然无赖地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③当了皇帝后恶习不改,一次,他怀拥戚夫人被周昌无意看到,他便骑在周昌脖子上。诸如此类描写,使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生动丰满,真实可信,表现出司马迁写实的史学风格。因此,《史记》为后世史书树立了“秉公直书”的规范,正是由于《史记》采用“善恶必书”的方法,即史学著作必须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必须按照历史事实的固有情况著录,才使历史成为“信史”^④。

三、创立了中国史学的系统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页。

② 刘知几著,张振佩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9页。

③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8页。

④ 黄新亚:《司马迁评传》,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明确表明他修《史记》不是一般的“网罗天下旧闻”,而是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他尽管是董仲舒的学生,但他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在《史记》中,他确立了人的地位,以人中心表现历史的进程。尤其是他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变”的角度审视历史,“通古今之变”,他认为历史总是在变化的,认为“物盛而衰,天地之常数也”。“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①。司马迁从“变”的角度观察古今变化,因此对诸多历史问题都能做出精辟的判断,最终可以使古今融会贯通,从而达到志古鉴今的目的,在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实现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也是《史记》不同于后来的史书之处。前辈学者对此已有精辟论述,如梁启超先生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说: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犹甚也。司马迁实当《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旨趣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也。

司马迁就是要借修史来实现自己的“一家言”,而他的一家言又是要在对汉武帝前中国历史作全面记载的基础上形成自己超卓的历史观,并使之成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史记》实现了司马迁这一宏阔的历史构想,也形成了中国史学的系统思想体系。其进步的、系统的历史观大略首先表现为大一统的历史观。《史记》叙述了从黄帝统一到汉武帝的大一统,特别是司马迁主张中华境内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华夏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一统,四方民族,均谓黄帝子孙。司马迁这一伟大构想,对形成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有非常大的作用。其次,则是他的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司马迁扬弃和改造了董仲舒的循环论,主张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对中国历史学是一大贡献。

第二节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司马迁不但是位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司马迁在记叙历史人物时,不是将人物变成历史事件的附庸,而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人生历程的记叙,揭示

^①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20页。

历史的内在规律,从而又集中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展示人物的人生和命运。另外,司马迁对人物的评价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寓论断于叙事”,在记述历史人物的生平事件中自然蕴含着对人物的评论,同时,他还能把自己对人物的爱憎褒贬之情融入叙事中。诸如此类书写人物的方法,使司马迁巧妙地将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使《史记》具有了很高的文学价值。

一、《史记》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司马迁之前,先秦历史散文由《尚书》《国语》《左传》到《战国策》,写人意识逐渐在加强,《史记》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史传的传统,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书写形式,因此,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同时也是我国纪传文学的开山之作。

首先,《史记》在写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与先秦历史散文相比,作为纪传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作的《史记》,在写人方面突破了《左传》《战国策》写人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使人物的活动在时、空方面得以大大扩展,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通过典型的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左传》《战国策》中也有细节描写,但《史记》更多、更精彩、刻画更细腻。如《陈涉世家》写陈涉佣耕时的叹息,《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乡党均分社肉,《李斯列传》写入厕见鼠,《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胯下之辱”等等,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充分显现出纪传体比编年体、国别体在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时的优势。第二,善于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刻画人物。如写项羽,最精彩的场面是鸿门宴。项羽与刘邦两大集团斗智斗勇,剑拔弩张,正是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塑造了项羽、刘邦、范增、张良、项伯、樊哙等生动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第三,善于运用对比烘托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中,魏王的昏聩平庸与魏公子的从容大度、平原君的假爱士与魏公子的真爱士、侯嬴的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仁爱无不形成对比,正是在这强烈的对比中更显示出魏公子的为人品性。另外,司马迁还有意识地在不同的篇与篇中构成对比,如《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间夹以《匈奴列传》,其用意是李广、卫青、霍去病,他们都和匈奴战争有关,但结果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李广一生廉洁奉公、爱护士卒;而霍去病却是“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赞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还有《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酷吏列传》和《循吏列传》等等都构成对比,表现出司马迁记史写人含无穷之意在言外的深意。除此之外,司马迁还运用了心理描写、人物的个性化语言等文学手法塑造人物,丰富了人物性格,在传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史记》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影响巨大。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学习先秦两汉散文,韩柳的一些纪传性质的散文明显有学习《史记》的痕迹,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故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古文雅正》卷九说柳宗元“文笔酷似子长”。明代的复古派“前后七子”、清代的古文流派“桐城派”都非常重视对《史记》的学习。《史记》对中国纪传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上的,也有艺术上的。首先,司马迁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使《史记》能够真实地反映汉代社会的现实,暴露封建统治者内部的丑恶,因为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所以更显现他超乎时代的胆识。其次,司马迁不是为写史而写史,而是在写历史人物的同时,寄托着自己的人

生理想,如通过《五帝本纪》歌颂禅让、歌颂天下为公,《李将军列传》歌颂李广的廉洁、爱士卒。第三,强烈的主观情感的倾注。《史记》是饱含司马迁情感的书,这是它远远超乎后来史书的内在因素。文学创作从本质上说是个体独立抒发感情的产物。司马迁是借历史的载体抒发他对社会的认识,表达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揭露,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读《史记》,我们能感觉到司马迁那颗在跳动的心,他对那些奸佞小人深恶痛绝,如在《平津侯列传》中他把汉武帝当朝权臣大儒公孙弘的丑态公之于众。公孙弘善于逢迎,以谄媚诡诈的手段取得武帝对他的重用。司马迁对公孙弘这种奸儒非常厌恶,故在他的传末写道:“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这一副词“竟”,恰恰表露出司马迁的强烈的主观情感,言外之意,这样坏的人竟然有如此好的结果真不可思议。班固在《汉书·公孙弘传》中删去了这个“竟”字,于是感情色彩大减。司马迁对汉代那些谄媚之徒深恶痛绝,但同时富有气节、为人正直的人予以赞颂,并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他的政治理想。在《张释之列传》里,司马迁塑造了一位“守法不阿意”的“长者”张释之,他敢于坚持真理,在汉文帝面前不亢不卑,坚持按律量刑,决狱公正从不阿谀顺从文帝。司马迁对“敢犯颜色,以达主义”的袁盎,“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的晁错,“不能容人之过”,“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的汲黯等正直之士进行歌颂,他喜欢用“其为人”这样的字眼对他们进行人格的透视,以此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将自己的崇尚之情倾注其间。

《史记》之后的传记文学,无论史传还是各类杂传,从体制到写人方法,都学习《史记》的传统,对此,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中有专章论述^①。

二、《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史记》和中国古典小说关系极为密切,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生、发展及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正像陈平原先生所说:“如果要问哪一种文章体裁影响于中国小说最深,历代小说评论家会毫不犹豫地公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②中国古典小说,从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代的传奇小说,再到明清的文言短篇及白话长篇小说,从其艺术风格来审视,无不表现出受《史记》纪传体的影响。首先是以人物形象的刻画来表现生活。《史记》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通过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历史,所以使《史记》又成为纪传文学的典范之作。《史记》塑造人物能够突出其个性,“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于专诸,聂政之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于纸上;《项羽本纪》,觉暗噁叱咤来薄人。”^③小说恰恰也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而且在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上尤其如此。其次是在叙事方法上。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小说从《史记》那里借鉴了许多成功的方法,前辈学者多有论述。如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就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

① 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第三章《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

③ (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斋藤正谦语。

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①毛宗岗说《三国演义》叙事“直与《史记》仿佛”。^②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也。”^③清嘉庆年间的二知道人在论及《红楼梦》里饱含曹雪芹的身世情感时就认为曹雪芹是从《史记》里融入的司马迁身世感慨所得来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虽稗官者流,宁无裨于名教乎?况马、曹同一穷愁著书,雪芹未受宫刑,此又差胜于牛马走者。”^④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由明清这几位杰出的小说评点家将古典小说与《史记》相比附的论述,就足以说明中国古典小说与《史记》的密切关系。

三、《史记》对中国戏曲的影响

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史记》更具有不可磨灭的史料学价值,尽管中国戏曲成熟期很晚,但可以说《史记》对形成中国戏曲观念、戏剧创作方法、戏曲的文化精神,无不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史记》记载的音乐理论和有关戏曲史料对我国戏曲艺术形成的影响。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我国从远古到汉代有关音乐的详细资料,尤其是专设《乐书》和《律书》来论述音乐,为后来史学家建立了修史典范,也总结了先秦以至汉代的音乐理论精华,确立了我国戏曲艺术强调音乐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理论原则: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

从音乐的起源,论述到音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人心感乐,乐声从心与乐感人心,心随声变。如是理论,可以说成为后来规范我国艺术的主臬。

《史记》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史料学意义。《史记·滑稽列传》中“优孟衣冠”的故事,向来被戏曲研究家视为中国戏曲形成的滥觞。

楚相孙叔敖……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

① 金圣叹:《金圣叹全集》(3),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

②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载朱一玄、刘敏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③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载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④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页。

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

优孟穿戴孙叔敖衣冠，装扮成孙叔敖的样子，言行举止，都模仿孙叔敖，既赞颂孙叔敖为官之清廉，又讽刺庄王不顾廉吏之后，此举已具有戏剧由演员扮演角色之艺术特质，故正如台湾著名戏剧理论家唐文标称赞说：“也许这正是中国戏剧的特质呢！”^①

《史记》中详细记述了秦汉百戏“角抵戏”的演出情况。百戏，是秦汉时期一种新兴的表演艺术，它是民间歌舞、杂技魔术、杂耍、体育竞技等各种表演的总称。“百”，即“多”的意思。《史记·李斯列传》中说：“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秦二世胡亥也曾曾在甘泉宫观看宫廷百戏的“角抵戏”表演。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考古人员曾在临潼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了一批非常罕见的陶俑，有的像是扛鼎者，有的像是持竿者，有的像是摔跤者，形状各异。这就是百戏俑。这些出土的文物有力地印证了《史记》里相关秦汉百戏记载的真实可信性。

西汉时期，生产力发展，封建经济蓬勃兴起，府库充盈。同时，由于与西域等地的联系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首都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艺人以及各种表演剧目都汇聚在此地。于是，长安出现了丰富的百戏，表演形式新奇、多样，技巧高超，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

总之，由《史记》相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测到中国戏曲形式的发展历程，故它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学意义。

其次，《史记》文化精神对戏曲的影响。

（一）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正直精神对戏曲的影响

司马迁具有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尽管他也说过“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之类话语，但他绝不以圣人的准则作为自己审视历史、评判人物的尺度。他可以把他的思想观念倾注在自己的文章中，从而形成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尊者讳的正直精神。因此，《史记》真实地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尤其是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描写，充分表现出司马迁正直不阿的精神风范。正是他的这种精神激励和鼓舞着后来无数个正直志士面对黑暗现实敢于为民呐喊。戏剧作品所具有的揭露社会黑暗的批判现实精神正是司马迁这种精神的体现。例如，被明人韩邦奇比做司马迁的元杂剧最杰出的作家关汉卿“能够像司马迁那样褒贬分明地描写元代社会的各色人物，敢于深刻揭露元代社会政治的黑暗和

^① 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社会上恶势力的猖獗”。^①关汉卿的杂剧始终贯穿着反映现实的精神,体现了他的正义、自由、平等的理念。据钟嗣成《录鬼簿》载,他共有杂剧63种,其中《薄太后走马救周勃》《升仙桥相如题柱》《鲁元公主三鞭奢》三种取材于《史记》,可惜今皆佚。但由此可证关汉卿肯定熟悉《史记》,故司马迁正直的人格必然对这位本身就具有狂傲不羁个性的戏剧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他现存的杂剧里,最具有批判现实精神的是《窦娥冤》,它表现出关汉卿对贪官当道、好人受欺的黑暗现实的极度愤慨,尤其是揭示了封建天道思想对人民的欺骗性,这无疑来源于司马迁。

(二)“爱奇”审美观的影响

李泽厚先生说:“在司马迁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儒道两家思想精华的一种很为理想的结合。”^②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正是儒道两家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他“虽生活在君主专制社会,但在情感气质上却最接近战国士林,尤其是这个阶层中的侠义之士。”^③他崇尚的是儒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④的个体意识和道家庄子所追求的精神自由、不受羁绊的独立精神。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评判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这就是扬雄所说的“爱奇”。对“爱奇”的具体含义历来有多种解释,如刘勰解释为“爱奇反经”(《史传》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解释为“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鲁迅说出了司马迁“爱奇”的本质。司马迁由于个人的遭际,形成了他喜爱千古奇人的审美意识。“爱奇”使他敢于突破传统,描写千古倜傥之士,从而使《史记》形成了后来史书难以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这种进步的价值取向为戏曲作者所赞赏,在戏曲作品中得以发扬。在后来的戏曲作品中,不管取材于历史,还是描写现实生活,都表现出剧作者不受礼教约束,崇尚奇特无羁精神的审美取向。他们借助戏曲以抒其志,这如同司马迁借《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样,他们要通过戏剧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抒发远大的情怀和对济世匡正理想的追求。因此,这类作品多取材于历史,正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其中,取材《史记》的历史剧大多保持了原作的精神,表现出司马迁“传畸人于千秋”的“爱奇”审美观。如《萧何月下追韩信》写了韩信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紧扣韩信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展示楚汉相争时这位叱咤风云、左右乾坤的英雄的人生。再如《伍员吹箫》中的伍员,《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渑池会》中的蔺相如,《介子推》中的介子推等无不是倜傥非常之人。

(三)悲剧精神的影响

《史记》可谓是悲剧人物的画廊,它里面洋溢着悲剧浓烈的壮美气息。司马迁塑造的悲剧人物主要有两类:一是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概,敢于以生命成就英名的悲剧英雄,如项羽、荆轲、豫让等。司马迁冲破了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的樊篱,极力赞颂他们活则活得痛痛快快,死则死得慷慨悲壮。另一类则是忍受屈辱,成就功名的悲壮之士,如伍子胥、范雎、韩信等。他在《伍子胥传赞》中深有感触地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尚须臾忘耶!”

① 俞樟华:《史记新论》,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② 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2页。

③ 《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